民胞物与：中国的生态文学观

张 皓

在中国绿色的大地上,很早就萌生了绿色的文学,呈现出一种古朴的生态观。例如,庄子追寻着“与麋鹿共处”的境界,陶渊明向往着“复得返自然”的快乐,杜甫写道:“邻鸡野哭如昨日,物色生态能几时。”^②流露出对于人世漂泊、生态失调的深切忧虑。古代诗人智者关注生态的殷殷之情被概括为“民胞物与”。北宋学者张载论述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③其意为:老百姓都是我的同胞,天下万物皆与我同类。主张以仁爱之心善待他人,关爱生

① 曾繁仁:《试论生态美学》,载《文艺研究》2002年第5期。

② 依次见于《庄子·盗跖》、陶渊明诗《归园田居》、杜甫诗《晓发公安》。

③ 张载:《西铭》,见《正蒙·乾称》。

态,关爱自然万物。

这种“民胞物与”的情怀依然延绵于中国当前的生态文学之中。如今世界上,战争、掠夺、污染、瘟疫疯狂肆虐,人与自然的冲突交织着经济冲突、文化冲突,形成空前的生态灾难,危及人类和整个地球的生存。作为对环境问题的一种回应,生态文艺思潮在西方,也在中国蓬勃兴起。中国的生态文学与批评,自觉地承担时代的责任,弘扬“生态关爱”的主题;并且由于具有绿色文学和以人为本的古老传统,中国作家的生态观显然有自己的特色,这就是以民胞物与的情怀,寻求自然与人文互动的和弦。

一 生态文学的兴起

生态文学或称为环境文学、绿色文学,包括描写大自然,描写人的生存处境,展示人与自然的关系,揭露生态灾难,表现环境保护意识,抒发生态情怀的文学作品与文学现象。生态环境指其题材内容,“绿色”取其象征意义。

尽管绿色文学古已有之,但是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潮流,它的兴起一般认为以美国女作家蕾切尔·卡逊发表《寂静的春天》为标志。全球生态危机激起绿色运动的波澜,生态文学的潮汐也在 中国大地涌动。20 多年来,中国的生态文学可以说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萌发伊始的阶段;二是 90 年代至世纪之交初具规模的阶段。

在当代中国,萌发阶段的生态文学是自发性地从感性表达开始的。事实上在 70 年代末就拉开了中国生态文学的序幕,出现了描写保护自然的作品,例如白族作家张长的一篇写森林保护的小说《希望的绿叶》^①,就是早期生态环境文学的代表作。自然本是维系人类生命的文学母题之一,反自然的社会行为却将它排除在外。在西方是技术与金钱至上,在中国当“文革”意识形态话语笼罩之

① 张长:《希望的绿叶》,《人民文学》1980年第9期。

时，“生态”自然缺席。新时期百废俱兴，自然环境也进入文学的视野。例如，率先反映环境污染问题的小说是李杭育1983年发表的《最后一个渔佬儿》，其中写道：“葛川江的污染一年比一年严重，……这两年，因为江里打不到鱼，小柴村的渔佬儿全都转业了，剩下他自己一个。”^①作家李杭育敏感地捕捉到工商业开发造成河流污染及人性扭曲的现象，以生态环境的恶化作为人物的背景，通过“最后一个渔佬儿”福奎的独特形象表达了对渔民生存状态的关切之情。接着出现的还有宋学武的短篇小说《干草》，描写草甸子被毁造成的生态危机；孔捷生的中篇小说《大林莽》表现严酷的大自然对人的威胁；而张承志在《北方的河》等作品中对大自然倾情赞美；王凤麟的短篇小说《野狼出没的山谷》以有灵性的狗为主角，表露了对动物的怜爱；高行健的复调话剧《野人》将生态学家推上舞台，以呼吁生态平衡为主要线索之一；郭雪波则以小说《沙狐》发轫，开始了他的沙漠生态文学之旅。上述作品在当时不一定就有明确的生态意识，却代表了中国生态文学萌动的自发趋向。直接以宏观纪实揭示环境危机的是报告文学，例如黄宗英的《小木屋》（1983）、沙青的《北京失去平衡》（1986）、徐刚的《伐木者，醒来》（1988），还应该提到台湾作家心岱的《大地反扑》和韩韩的《红树林生在这里》等作品。这些报告文学的作家自觉地关注环境问题，为中国生态文学写下了不可忘记的一页。

90年代以来，中国生态文学有了长足发展，一部分作家自觉地举起生态环境文学的旗帜，并且从浅层的环保题材转向广阔深入的生态领域，使之初具规模。其标志之一是出现了生态文学的创作群体，有专门从事生态文学创作的作家，如报告文学作家徐刚、李青松，小说作家郭雪波、哲夫，散文作家苇岸、红柯，儿童文学作家刘先平、方敏等；著名作家王蒙、谌容等人热情参与生态文学创作。其二是涌现了众多的生态文学作品。例如，生态报告文学的代表有徐刚的《守望家园》、《地球传》、《长江传》、《大地书》等

系列作品，还有李青松的《遥远的虎啸》、乔迈的《中国：水危机》、陈桂棣的《淮河的警告》、王治安的《人类生存三部曲》等；仅《守望家园》就包括海洋卷、土地卷、江河卷、森林卷、动物卷、星云卷6本。生态小说的代表有哲夫以严酷的夸张手法创作的《天猎》、《地猎》、《猎天》、《猎地》、《猎人》等“黑色生态批判”系列长篇，有蒙古族作家郭雪波描写牧民古朴风情的《大漠魂》等“大漠生态小说”，有哈萨克族作家朱玛拜描写草原生存状态的《蓝血》、《生存》等“草原生态小说”，有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小说；还有谌容的长篇小说《死河》，陈建功的《放生》，张抗抗的《沙暴》，胡发云的《老海失踪》，贾平凹的《怀念狼》；生态散文的代表有李存葆的《鲸殇》，苇岸的《大地上的事情》，李景平的《绿歌》，刘先平的“大自然探险”系列文学；生态诗歌的代表有于坚的《棕榈之死》，李松涛的《拒绝末日》等。这些作品从各个角度扩展了生态文学的内容。其标志之三是成立了“环境文学研究会”，召开了多次生态文学研讨会，发表了“绿色宣言”、“绿色倡议”，出版了生态文学的系列丛书多种，例如3辑9大卷“碧蓝绿文丛”包括小说、报告文学和散文随笔各3卷，还有“人与自然丛书”、“人与动物系列丛书”等等。2003年，中国首届环境文学优秀作品奖颁发，分设有散文奖、理论奖、小说奖、诗歌奖和报告文学奖，仅小说奖的获奖作品就有杜光辉的《哦，我的可可西里》、叶广芩的《老虎大福》、方敏的《大绝唱》、郭雪波的《大漠狼孩》、铁凝的《秀色》、陈应松的《松鸦为什么鸣叫》、张炜的《鱼的故事》、彭鸽子的长篇《红嘴鸥的寻觅》等8部，标志着中国的生态环境文学创作初见成效。

作为生态文学的一种理论形态，生态批评也随之兴起，以蓬勃的活力出现于全球化语境中，成为跨文化对话的一支生力军。2000年，美国学者加布理尔·施瓦布在中国的刊物上发表文章说：“现在有一新发起的批评理论，我们一般称之为生态批评。”^①

^① 李杭育：《最后一个渔佬儿》，《当代》1983年第2期。

^① [美]加布理尔·施瓦布：《理论的旅行和全球化的力量》，《文学评论》2000年第2期。

中国的生态批评大致萌芽于80年代,在两个世纪之交显示出勃发的生命力。例如,1987年,鲍昌主编的《文学艺术新术语词典》收有“文艺生态学”辞条,张韧提出“建立中国的环境文学”;1988年,夏中义出版《艺术链》,书中有专章“文学生态论”;1992年第10期《新华文摘》介绍了“文学生态学”。此后,缪俊杰、曾繁仁、鲁枢元、王先霏、张韧等人接连发表生态美学与生态批评论文,并且出版了《生态文艺学》、《文艺的绿色之思》、《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中国文艺生态思想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生态意识透视》、《欧美生态文学》等一系列专著。^①鲜明的现实感、使命感和责任感使生态文学批评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由此表现出“民胞物与”的情怀,是中国生态文学最有光彩的亮点之一。

二 生态关爱的主题

生态文学的兴起昭示着人类的一种根本需求:生态关爱。生态失衡的地球需要关爱,地球上的人类更需要关爱。人类的生态主要指人与入、人与自然物相生共存的关系。所谓生态关爱就是指对人与自然共处的世界的关心和爱护,对人类生存环境的珍惜,对大自然和一切生命的敬重。这种关爱,正是中国生态文学的主题。

人本是自然之子,关爱自然本是文学不可缺少的主题。中国文学素有关爱自然的传统。例如,诗人杜甫的关爱之心及于一花一草一虫一鸟,他曾吟道:“春草何曾歇,寒花亦可怜。”又自我认同于可爱的小动物:“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对于“设网提纲”残害生灵的反生态行径,诗人愤怒地斥责道:“暴殄天

^① 鲁枢元:《生态文艺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曾永成《文艺的绿色之思》,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曾繁仁《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张皓主编“文艺生态探索丛书”(《中国文艺生态思想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生态意识透视》等4部),武汉出版社2002年出版;王诺《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

物圣所哀。”^①时至今日,由于工业技术和消费欲望的恶性膨胀,大自然成为人类征服和利用的对象,“暴殄天物”的程度远远超过了杜甫的时代。失去关爱的环境反过来危及人类的生存,近几年的洪水、沙尘暴、“温室效应”、“非典”瘟疫等灾害其实都是大自然的某种报复。例如张抗抗的中篇小说《沙暴》描写人对草原的毁坏和沙尘暴对人类的惩罚。^②在草原插队的知青为了回城而猎杀老鹰,用鹰爪“走后门”打通关节。草原上的老鼠失去天敌老鹰而大量繁殖,草原被掏空而严重沙化。当年的知青辛建生对自己打过老鹰的行为深感悔恨,他感到如今袭击北京的沙尘暴就是一种报复。但是生活的窘迫、致富的欲望使他经不起诱惑,终于跟随同伴重返草原去猎鹰。这篇小说通过一种“猎鹰”的怪圈,揭示生态关爱缺失的危机。猎鹰是为了人自身的利益,结果受到惩罚的还是人类。人不能离开自然而生存,更不能靠毁坏自然获取生活享受。人类只有尊重自然、关爱自然才能保持良好的生态,获得生存的根本条件。

生态关爱的缺失还形象地表现在陈应松的小说《狂犬事件》中,作品描写两条疯狗闯入神农架大山中的“忘乡村”使人畜遭殃的怪事。老村长率领村民展开了一场抵抗疫情蔓延的生存保卫战,由此呈现出中国内地偏僻山村的闭塞落后和山民的贫困生态。^③这部独特的写“狂犬”疫情的小说发表在“非典”与“禽流感”事件之前,表现了对于瘟疫流行的预感,揭示了生态关爱缺失的危机。当前,世界各国争相追逐经济的高速发展,谁来关爱荒野的生态,谁来关爱贫困的农民?如法国学者莫斯科维奇的分析,当今豪强主宰的社会已成为“反自然的社会”,他的《反自然的社会》一书引用了生物学家康拉德·洛伦茨的一段话:“人类正在逐步地破坏自然,正在蹂躏自己赖以生存的群落环境。”^④我们必须重

^① 依次见于杜甫诗《秋日夔府咏怀寄郑监李宾客》、《江村》、《又观打鱼》。

^② 张抗抗:《沙暴》,《小说界》1993年第2期。

^③ 陈应松:《狂犬事件》,《上海文学》2002年第10期。

^④ 转引自〔法〕莫斯科维奇《反自然的社会》第255页,黄玉兰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新认识与自然的关系,反思人类“究竟从哪里开始走错了路”。英国批评家乔纳森·贝特通过分析奥斯汀与哈代的作品在当代流行的现象,指出人们对逝去的“绿荫”文明留恋不已,企盼关爱自然的意识的“苏醒”。^①文学可以书写“崇尚自然”的神话,可以声讨“暴殄天物”的恶行,可以质疑“征服自然”的妄想,可以表达“回归自然”的愿望;可以思考人与自然冲突的症结,可以寻找人与自然相乐的和弦。这一切都离不开生态关爱。

中国的生态文学观,具有“生生之谓易”、“民胞物与”的传统,主张人与自然的亲和。寻找人与自然关爱的和弦,正是中国生态文学作家的愿望。例如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等作品以平静的心态轻抚着这关爱的和弦,张承志的《北方的河》等作品以激荡的心潮呼唤着这关爱的和弦。同时,生态关爱还体现为关注社会现实,关注弱者生存。在全球反霸权运动的历史时期,文学不能屈从于跨国资本的霸权话语,不应该听任资本权力对弱势群体对大自然的蹂躏。而应该脚踏实地地为弱者的生存为整个地球的生态而呼吁。这种呼吁和抗争在我们的文学中已经有所表现。例如肖克凡的中篇小说《最后一座工厂》揭露了跨国资本将环境污染转移到中国的企图。这部小说描写某市一座国有工厂面临破产,在与外商合资兴建石棉厂的谈判中,厂长江有礼发现外商引进的设备不合环保标准,由此产生的污染会使工人患石棉肺,因而拒绝签字。结果这位坚持维护我国生态环境的厂长却被上级公司撤职,更可悲的是他得不到群众的理解而挨骂,有的工人说:“什么石棉肺,合资之后每月工资最少八九百吧?管他娘的什么职业病,好死不如赖活!”^②小说揭示的国有企业的生存现状和缺乏生态意识的状况实在令人震惊。为了呼唤生态关爱、建设生态文明,必须抛弃那种目光浅短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致富主张,纠正那种趋炎附势

地表白“我爱美元”或用刺激躯体去媚俗牟利的写作倾向,揭露跨国资本控制消费潮流而危害生态的事实。

事实表明,单靠技术并不能解决环境问题。人们被日益膨胀的欲望与超前消费的潮流鼓动着而忘乎所以,富国想更富,穷国要致富,一批野心勃勃的人想暴富。富裕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其结果必然是更疯狂地破坏生态。这种只顾眼前利益而漠视人类根本利益的行为,根源于个人中心主义和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而受制于资本权力的操纵。繁荣富裕的攀比排斥生态运动的发展。生态问题又成为繁荣富裕不可逾越的障碍。法国夏尔-雷奥波·马耶人类进步基金会主席皮埃尔·卡兰姆说:“环境与生态问题从根本意义上来说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科学问题,它更是一种思想问题。”而“如果我们仅仅关注于解决具体问题,那实际上是治标不治本”。^①一边治理环境又一边更严重地破坏,也就是“治标不治本”。“本”是什么?按西方的逻辑思维方式,可以说是一种思想认识问题。而从中国的审美思维方式来看,生态问题本是一个需要关爱的生存问题。意识到一切动物、植物、乃至无机物与人类在地球上同舟共济、生死与共才是“本”,民胞物与式的生态关爱才是“本”。

三 民胞物与的情怀

生态关爱既是人类的根本需求,是文学不可缺失的主题。那么,它与文学的传统主题“人文关怀”是否一致呢?从中国文学的生态观来看,生态关爱与人文关怀实际上统一于“民胞物与”的思想之中。“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不仅包含着仁爱民众的观念,而且包含着博爱自然万物的情怀。

抒写民胞物与情怀的诗人代表是杜甫。他的诗篇饱含忧民之

① [英]乔纳森·贝特:《文化与环境:从奥斯汀到哈代》,王宁编《新文学史》第285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② 肖克凡:《最后一座工厂》,《当代》1997年第4期。

① 转引自记者孙冬梅、张九雨:《“荒原焦虑”与人类责任》,2003年4月9日《中华读书报》。

情，又将博大的仁爱之心推及自然万物，他写道：“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鸟山花吾友于。”视自然界的花鸟为友于兄弟。诗人常以爱物之心与可爱的生物平等对话，如“荆扉对麋鹿，应共尔为群。”又如“鸬鹚鸂鶒莫漫喜，吾与汝曹俱眼明。”^①物与之情，天真烂漫。诗人甘愿与麋鹿为群，同鱼鸟共乐，在与万物同乐中展现出民胞物与的情怀，获得自由自适之乐。这种生态观既不同于“人类中心主义”征服自然的观点，也不同于否定人文关怀的偏见。这不是一种造物主或救世主居高临下的架势，而是一种关爱自然博爱民众期盼和谐相处的态度，是生态关爱和人文关怀的融合。当代中国的生态文学承续了民胞物与的传统精神，或将人文关怀融入生态关爱以寻求人与自然的和弦；或是揭示环境保护中人与自然的矛盾来反思生态关爱和人文关怀的不可缺少。

例如，胡发云的小说《老海失踪》就形象地表现出环境保护中人与自然的矛盾冲突。作品描写一位自愿献身于环境保护事业的记者老海，他发现并报道了原始林区乌嘯边的“女峡”和“乌猴”，引起该地区的开发而危及自然生态。面对大规模砍树、修公路、捕杀乌猴的现实，老海深深忏悔说：“因为我的幼稚、无知、虚荣与妄想，人类开始了对乌嘯边对乌猴对大自然的疯狂虐杀与毁灭。”是继续开发使山区尽快富起来，还是保护环境让山民依旧贫困？老海就是处在矛盾困惑中的一个人物。他觉悟到必须保护自然原生态而悔恨不已，于是毅然舍弃大城市的优裕生活和聪慧的妻子，情愿长住在深山老林做守护乌猴的卫士。他毫不留情地与盗猎乌猴的人展开搏斗。可是捉住的那些猎猴者多是贫苦的山民，他们卖乌猴的钱还没有拿到手，就“枪毙的枪毙，坐牢的坐牢，剩下些老弱妇孺过着贫苦甚至更加贫苦的日子。”这些贫穷的山民需不需要关怀呢？是保护乌猴重要还是山民的生存重要？这简直是一个两难问题。老海认为：“有人在保护区内一天，那些野兽就一天不得安宁。”他主张迁出山民，封闭旅游景点。而在官员们看来，“总

不能让猴子活着人饿死吧”。经过多次激烈的争论，老海陷入了更深的矛盾痛苦。他一方面对“人类的文明”表示“绝望”，以至于不要孩子读书；一方面拍摄下人们毁坏自然生态的镜头，并且不惜为反盗猎而牺牲，他说：“我这样做，只是一种仪式，为我曾做过的一切赎罪。”^①从小说的叙述中，可见老海本是一个热爱生活、重情义的人，生态觉醒使他的人文关怀转向对动植物的关爱，与周围的对现代文明的热烈追求相比，他成为一个不合时尚的孤独者。关爱生态的“赎罪”行为，被世俗文明边缘化了。老海的悲剧表明，失去了人文关怀的环境保护实际上行不通。关爱生态，谈何容易！保护自然，说说无妨。真的实行起来，就不免同人的利益相冲突。怎样落实民胞物与的精神，警醒世人将生态关爱和人文关怀融合一致，或许是这部作品的言外之意。

民胞物与的精神在中国生态文学中的另一种表现，是寻找人文与自然互动的和弦。其实这和弦就在“关爱”之中。从根本上说，人类再也不能只靠斗争维持生存，更多的是需要关爱，关爱人生，关爱百姓，关爱自然。人文关怀需要融入对自然的关爱，在生态关爱中获得对人的关怀。人类如果失去了精神家园就无所谓生态关爱，如果抛弃了自然家园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人文关怀。郭雪波的中篇小说《大漠魂》可以说是寻找这种关爱和弦的一段心路历程。小说淋漓酣畅地描写了内蒙古沙地上祭天祈雨跳安代舞的场面，叙说了一对“安代舞王”和“安代娘娘”经历大漠狂舞而生死悲欢的故事，展现了蒙族农民在恶劣的环境中与大自然共生存的精魂。安代舞既是古老文化的代表，又具有与上苍沟通的隐秘涵义。安代娘娘荷叶婊一辈子痴迷于安代舞，“她的生命离不开‘安代’，她在‘安代’中沉醉超脱，并在‘安代’中寻求……”她不惜为跳安代舞献出生命。安代舞王老双阳则苦心孤诣地在干旱的沙地里寻找着生命，他艰难培育的红糜子终于生长成熟。这种执着地现实求索与安代舞的性灵倾泻最终融而为一，在对荷叶婊的

^① 依次见于杜甫诗《岳麓山道林二寺行》、《晓望》、《春水生二绝》。

^① 胡发云：《老海失踪》，《中国作家》1999年第1期。

祭奠中奏响了关爱自然与人文的和弦。他抱着垂危的荷叶去看红糜子，她临终时吐露心扉：“俺寻找的‘安代’的魂，原来却是个绿色的精灵……”^①他为心爱的荷叶而起舞，为生死与共的大自然而舞，步武神圣而凝重。作品从地域文化和原始宗教层面展示民情习俗，关注社会底层普通人的生命底蕴，探察大漠生态的奥秘。其中写道，老双阳和他的干儿子在照看红糜子的一天深夜险些被流沙淹没，幸亏他们不忍心杀掉的“跳兔”（一种野鼠）拼命打洞而获救。这或许表明，人类滥毁生态使土壤沙化险遭灭顶之灾，只有关爱动植物与自然界互助才能获救。要摆脱人类的困境，只能靠互相关爱。这种民胞物与的情怀正是中国生态文学观的体现。

然而当今世界上还充斥着人际间的仇恨与战争，蔓延着对大自然的掠夺与破坏。主要问题并非人文关怀与生态保护有无矛盾，而在于人与人的关爱、人与自然的关爱都太少了。中国作家致力于生态关爱的探索和表达，作为人类对环境问题的一种回应，将会引起世界性的反响。美国生态学家托马斯·柏励提出“走向生态纪元”的口号，他认为“这个纪元不能是以人类为中心的”，而只有依靠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依存的新模式，同时，“生态纪如果没有人的参与，几乎就不具有任何重要的意义。”^②这种观点注意到人与自然两个方面，与中国的生态文学观有相通之处。环境问题要治本，就要对大自然承担责任，并且用真诚的关爱弥补从前的过失。在全球化时代，人类特别需要绿色关怀，需要适合人性的可持续发展。正是在这一点上，民胞物与的生态观，具有特别的启示意义。

① 郭雪波：《大漠魂》，《长江文艺》1998年第12期。

② [美]托马斯·柏励：《生态纪元》，《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年第11期。